绪论　宗教与政体

往日已经证明是持久的体制的基础已奠定于人们的信念深处，奠定于某种固定的和明确的原则，其奠基之深致使成为他们本身的组成部分，它涉及他们最强大的动机和原则，他们把这些动机原则奉为不言而喻的东西，这些动机和原则把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带入与他人生命的和谐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宇宙和谐。这些信念形成得慢，打破也慢。①

——詹姆斯·布赖斯②

提出宗教与政体这样一个题目，首先是基于一个事实：

①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432 页。

②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1838—1922），出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城，先后就读于格拉斯大学和牛津大学，1862 年获牛津三一学院文学学士学位，后又于 1870 年获民法学博士学位。他学识博洽，见解深邃，是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他在政治上属于自由党，并以自由党人身份长期担任议会下院议员（1880—1907 年），成为该党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数度参加自由党内阁，历任外交次官、兰开斯特公爵领事大臣、贸易大臣、爱尔兰事务大臣等要职。1907 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美大使，在华盛顿任职期间赢得很高的荣誉。1913 年自大使任上退休，次年被授封为子爵。1922 年在德文郡锡德茅思逝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欧洲工业国家，也就是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欧洲国家，采取了两种对立的政权组织形式，一曰共和制①，一曰君主制②。然而，这两种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除了国家元首产生的方法不同，前者是选举产生，后者是君主出任；在其他的根本制度上并无大的差别。于是，人们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两种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只是因形式需要的一种存在，还是在这形式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原因？显然，答案是后者。

在我们以往的观念里，君主制是与封建制度、保守、反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考察欧洲君主制的代表——英国，我们会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首先，英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因此而发端，工业革命由此而起源。即使是民主政治这样的制度，其源头也在这个君主制的英国，而不是来源于共和制的法国，更不是来源于“民主楷模”的美国。正如迪·托克威尔所说：“美国人生而平等，因而从未为创造平等而操心；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革命的果实。美利坚合众国一诞生便引进了 17 世纪英国的政府形式、政体和施政方法。”③ 看来，我们那些思维惯性得改一改，不然怎能弄清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现代民主政体，竟会出

①共和制：“君主制”的对称。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叫共和国

② 君主制：“共和制”的对称。以君主（国王或皇帝等）为国家元首的政权组织形式。

③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6—7 页。

自这个“封建余孽”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个貌似保守、周身贵族脾气的英国，在欧洲摆脱中世纪走向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发动者、排头兵的重要角色，并由此奠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最初基石。我们至今还稀里糊涂地将英国与保守扯在一起，殊不知，英国反倒是革命的先行者。只不过它的革命没他人火暴，再加之它和君主、宗教这些中世纪的概念又有些说不清的关系，在我们这些喜欢时髦的公众心头自然也就失去了地位。

然而，历史终归是历史，英国对现代政体和经济制度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在肯定它对历史贡献的同时，我们依然抱着一个疑问并按我们的惯性思维提问：既然你处处都革命了，为何还拖着一条君主的辫子？这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吗？依我们的脾气，你那个英国王室留有何用？

英国选择君主政体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答曰：宗教。当然，这里肯定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然而宗教则是这诸多因素中的重要部分。这恰好是我们以往的研究中不太重视的环节，以致我们至今对政体与宗教间的关系知之甚少。考察欧洲各国的政体，除英国之外，选择君主制的不在少数，我们只要稍稍留心一下他们的宗教形态，就可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来。那就是：凡属以新教（抗罗宗）为国教的国家，绝大多数采用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基于这个线索，我们提出了宗教与政体这样的题目，其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国家宗教与政体问题的研究，引出对我们有价值的借鉴来。

在研究君主制国家政体与宗教关系的同时，我们也研究了共和制国家的政体与宗教的关系。比如法国，他们选择共

和政体的原因是什么？与英国一样，虽然这里也有政治的原因和经济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宗教。他们之所以能够选择共和，其根本原因在于罗马教廷和教皇的存在。对于像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宗教传统和宗教权威是由罗马教廷和教皇所代表，国王没有神权象征的意义。因此，他们可以选择共和。既然宗教在政体选择上具有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是如何认识的呢？这种认识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正是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我们通过研究宗教改革后基督教的实际状况，以及不同类型国家的个案，来弄清宗教与政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正误对社会的影响，从中找出一般规律，并以此反观我们自身。尤其在宗教这一问题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以往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盲区。但是，我们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可知，宗教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和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欧洲宗教与政体关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宗教在政体选择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往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局限，始终看不到这一点，以致在我们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革中，付出了许多不必要的代价。因此，无论是为了昨天的历史，还是为了明天的进步，我们都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本书的论述旨在通过一些历史事实，弄清现代政体与以往传统、尤其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处理这种关系的正确与否，给我们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要真正理解这一问题，不能从政体本身着手，而要从这个国家的宗教历史和宗教格局着手。这里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政体与宗教联系的线索外，更重要的要从宗教在一个国家

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来理解这一问题。无论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的知识都告诉我们，宗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重要性不在政治权力之下，有时甚至超过政治权力。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神权就超越在王权之上，这是不争的事实。宗教改革之后，神权有所削弱，但并不是说宗教的力量就消失了，它至今依然悄悄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宗教；而这些国家的大多数的人，都信仰着这样或那样的宗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S. G. F. 布兰顿在《比较宗教学辞典》中有一段话，对我们理解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也许有用："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在今天对我们共同的人性及其问题得到明智的理解，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宗教，正如了解它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了解它的科学与文化成就一样，因为不论人们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方面评价如何，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重要意义总是最基本的。"① C. W 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中说："宗教为我们的生活规定了一种全面的模式，规定了一条遵循到底的道理。"② 即使是科学、工业革命、现代政体这类表面上与宗教相对立的事物，从根本上讲也是宗教自身运动和发展的产物。我们

① S. G. F. 布兰顿：《比较宗教学辞典》(1970)，第 1 页（转引自埃里克·J. 夏普《比较宗教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7 页）。

② C. W. 莫里斯：《开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今天所要研究的，就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教，即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宗教，以及它与政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得出我们的结论。

马克斯·韦伯[①] 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它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支持，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则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即基督教新教的伦理。从基督教新教运动看工业文明的建立，我们十分清楚在所有的制度之前或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文化基础，存在着一个最高准则。可以说，没有新教运动，没有新教伦理，就没有工业社会这个新文明。作为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始终与宗教的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们既可以把它看做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宗教改革的产物。恩格斯把加尔文和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称之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这一决战的结果，在意识形态层面产生了新教伦理，在上层建筑则产生了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即以宪法和宪政为代表的现代政体和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当我们面对君主立宪和共和两种不同的政体之时，事实上，已经看到了不同的宗教背景对政体的影响，

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雄心勃勃的考察研究构成了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

但这依然是表面的。

我们真正想弄清楚并从中得到借鉴的是，除了对政体的影响，这些国家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他们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得失是如何反映到社会上来的？哪些给社会造成了灾难、哪些给社会带来了安定？同时也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在与中世纪宗教神权作斗争的同时，又将宗教带进了现代，让它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并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们先简要地分清这两种不同政权组织形式的异同，只有说明了共和制与君主制在本质上的相近或相似，才能把国家元首产生方式上的差异的原因追溯到宗教上去。在欧洲的近代史上，共和制也是异数，主流则是君主立宪制政体。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进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反对专制独裁，而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建立立宪政体则是这一政治改革的核心。因此，现代民主政体的要害是宪政，而非共和，宪政是共和与君主制的共同政治原则。

宪法和立宪的一般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①] 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宪法（politeia，一译政制、政体）一词的意义之一是“一国之内各机关的安排”。近代立宪政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特

①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科学家。他是西方思想史中实在论哲学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思想对西方文化教育的根本倾向以至内容有很大影响；他的体系是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院哲学的支柱和媒介。其主要贡献在于他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使推理彻底一贯达到最大效果。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对许多学科都有贡献，特别是为经验科学的进展奠定了基础。

别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有关思想，他们认为国家的产生不是基于神意，而是基于社会契约。洛克主张确实保障人的自然权利，契约成立后政府须忠实于人民的信托，如果政府破坏契约，或违反宪法，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洛克还提出协调君主和议会权力的分权思想，防止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卢梭将所有公民会合在一个拥有全权的主权中，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个人必须服从；他主张全体人民普遍参加立法，少数服从多数。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思想，在美国《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被奉为神圣，对美、法两国在革命时代制定宪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美、法、19世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主义思想有重大的影响，并在立宪民主政体中得到体现①。

弄清了什么是宪政，再来看什么是共和制与君主制。共和制和君主制的不同在于是否保留了君主，但这一层的要害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宗教。在欧洲，一个国家政体的确立，大多与宗教改革时期形成的宗教格局有关。如英国的君主制与英国的国教会②。在法国，情况相对复杂一些。大革命时期的共和制与加尔文的日内瓦教务会③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537页。

② 国教会：即圣公会。见本书第11页注①。

③日内瓦教务会（Consistoire de Geneve）是日内瓦归正会和市政当局合作的半教会、半国家的权力机构。1541年加尔文返回日内瓦，获得市政当局支持，建立日内瓦归正会，制定教会规章。之后，加尔文致力于向其他国家传播新教教义，除宗教活动外，也进行政治活动。日内瓦教务会是加尔文利用旧约律法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形式。

有关。而此后，拿破仑凭借武力，取神圣罗马帝国而代之，恢复了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也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地位。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基本是君主制。

因此，要说明不同政体的宗教因素，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都是现代政体，在本质上都属于同一历史时期即工业文明时期的民主立宪政体。而在以往我们的认识中，对此是朦胧的。从 15 世纪的文艺复兴到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奠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而 17 世纪开始于英格兰的政治革命，则奠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胜局。“这场政治革命在 18 世纪震动了法国，并在 19 世纪影响到意大利和德国”①，进而影响到全世界。而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先有对技术层面船坚炮利的认识，再有对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认识，最后才有了对意识层面的宗教问题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也符合人类思维从具象到本质的一般过程，但我们的思维确实也过于迟钝了一些。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整体意义上的革命，首先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进步，而后方有其后的政治革命，而工业革命则是思想进步和政治革命的结果而已。是思想进步推动了社会进步，推动了工业革命；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基督教历史，是给不太

① 詹姆斯·布顿斯：《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430 页。

熟悉基督教历史的读者写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在阅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之前对基督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正因为是基本的，自然十分粗略，对专业人士而言这是可有可无的，对非专业人士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他们对基督教没有一个基本了解之前，后面的章节很难读下去。第一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讲了基督教简史。除了对基督教早期的历史稍着笔墨外，其余部分都是简而又简。基督教早期的历史一般读者都不很清楚，我希望在这极小的篇幅里使读者能够有所了解。其中部分主要参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像这种简略的历史描述，很难有什么样的著作具有如此的权威性。其余三章，分别就天主教、新教（抗罗宗）、东正教进行了介绍，但又不局限于单纯的教派介绍，而是侧重于教会所代表的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的介绍。比如天主教与神圣罗马，新教与英国王室，东正教与东罗马。为什么要这样介绍？理由很简单：没有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殊荣，就没有基督教在西方的显赫。因此，要了解基督教各派的历史，就不能不了解罗马帝国的历史。罗马帝国对西方征服、统治到衰亡的历史，既是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史，也是西方各国从蛮族部落走向封建、走向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与罗马帝国相关部分摘录了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但作了必要的缩写。总之，第一部分就是以简史的方式，给不熟悉西方史的读者做一点铺垫，以便于他们阅读后面的章节。

本书的第二部分，通过描述三个西方工业国家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它们选择不同政体的原因。其中第五章

特别论述了圣公会[①] 成为英国国教，以及英国国王作为英国国教的精神领袖的背景，并指出这是英国选择君主立宪制的直接原因。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模式，基本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抗罗宗为国教的国家的情况。而这些国家的政体模式却能有效地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多数抗罗宗为国教的国家，都因保留宗教领袖而选择了君主立宪制。这一观点是否可以推广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

法国的政体模式与英国相反，而背后的宗教原因却完

① 圣公会：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都有，总称圣公宗（也译为“安立甘宗”）。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成立“中华圣公会”，（Holy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圣公会”一词，为该会在中国的名称，后用于翻译该会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圣公会于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当时英国君主专制统治加强，要求摆脱罗马教皇控制的倾向日趋强烈；新兴资产阶级和逐渐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也渴望削弱教会特权，夺取教会财产。英国亨利八世（Henry Vlll，1491—1547）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支持下，以教皇不准他废黜王后（西班牙公主）、离婚重娶为导因，于 1532 年促使国会向罗马教廷缴付贡金，1534 年又促使国会通过法案，规定英国教会不再受制于教皇而以英王为最高元首，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不包括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成为法定的国家教会，称为“英国国教会”，即英国圣公会。该会产生初期，在教义、仪式和组织制度方面大量因袭天主教传统，恩格斯曾称之为“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2 页）。17 世纪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受到加尔文派很大影响，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19 世纪起，英国圣公会内产生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两大对立的派别。前者主张恢复天主教传统，要求维持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后者反对恢复天主教传统，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随着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圣公会也逐步向世界各地发展。18 世纪末美国独立后，脱离英国国教而独立的美国圣公会正式成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相同，也就是说，其在宗教层面的规律是一样的。因此，第六章我们论述了法国选择共和制，其原因在于罗马教廷对法国天主教会的宗主关系。一般地讲，天主教国家的宗教领袖或精神领袖都不是国王，而是罗马教皇，他们没有宗教领袖如何保留的问题。因此，天主教国家在政体选择上都有相当的自由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法国选择了共和制。英、法两种不同的政体模式所反映的只是宗教领袖不同，而不是政治内涵的不同。该章还对法国大革命的动乱与宗教间的关系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因为这是理解法国与罗马教廷重归于好的一把钥匙。对于法国大革命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极端自由之说及其卢梭本人，该章将其放在文化历史的坐标上去分析和理解。通过这样的分析，加深我们对严复下述论断的理解，即：“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故其孽果无可解免。’①

德国的情况相对复杂，但在本质上与英、法没有两样。路德宗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上千年的历史情结，也割不断与罗马教廷和教皇在精神上的联系。本来以英、法两种模式已能说明政体选择与宗教的关系，但德国的情况似乎又给这个立论留下一个漏洞，特别是作为新教一个最重要的派别路德宗的故乡，它的政体选择的结果几乎可以使人轻意地否认前面的立论，因此专列第七章用以说明。

①严复：《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56 页。

第三部分讨论的是宗教与社会控制的问题，最终想说明的是：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得当与否，将会给社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后果。第八章阿莱维命题[①] 以宗教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为线索，深入地探讨了宗教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与意义。该章结合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把围绕着工业革命时期的宗教与社会的研究引向历史的更深处，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在新宗教与法西斯的第九章里，集中分析了路德的宗教改革与德国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黑格尔、尼采等人的哲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路德的宗教改革客观上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使一直以帝国主宰自居的德意志民族同样处于崩溃的边缘。出于自救，德意志人首先要找回的是精神上的自我，找回德意志民族存在的概念。因此，这个事实上是由基督教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民族，不得不回到德意志早期的文化荒原上，回到基督教世俗来源部分的希腊文化上去重建自己的文化。然而，这种重建的、又如此灿烂的文化，真的能割断与神学母体的精神纽带吗？不能。惟一割断的是上帝，那个制衡着有限界的无限，那个制衡着兽性的神性。“上帝死了”（尼采语），纳粹生了。在偶像失落的真空里，那些咒骂着上帝的人

① 埃利·阿莱维（Elie Halevy）是法国历史学家，他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宗教热忱运动与法国的革命政治运动进行了对比，发现了宗教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的结论是，英国工人阶级所以不受革命的政治意识的影响，是由于它的有潜力的领袖们被循道宗和福音派的宗教吸引住了。这一论点在宗教学里称之为“阿莱维命题。”

们，几乎都成了 20 世纪的新上帝。失去了神性，人性将倒退到兽性那里。因此，人奴役人的世界，就成了人屠杀人的世界。从宗教裁判所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巴士底监狱到纳粹毒气室，新宗教的使徒们终于完成了从人到兽的转变历程。本书的最后一章，分析了前苏联的解体在宗教与信仰上的原因。苏维埃联盟的核心是俄罗斯，而俄罗斯这个民族则是由东正教文化所塑造的民族。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同时也面临着宗教变革的问题。但革命的信仰与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忽视了这一点，致使苏联在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处于社会动乱之中。这个动乱的根源不光是来自国外的敌对势力，更多的是来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甚至来自作为苏维埃政权基础的工农大众。从人类学可知，任何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是这个社会多数人确认的价值基础，而这个价值基础往往是包含在一个民族传统的宗教体系之中。当苏维埃政权否定了传统的价值基础，并选择革命作为信仰、作为价值基础之时，这意味着他们不光放弃了宗教这个控制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把自己摆在了被颠覆的危险境地上。因为革命这个概念的逻辑内核只有暴力和颠覆的合法性，而没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它很难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价值基础。这也是斯大林不得不走向专制独裁、个人迷信的政治道路的原因之一。而专制独裁的政治道路，不光窒息了苏联社会的生机，进而走向崩溃，同时也把斯大林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俄罗斯是东正教所塑造的民族，也是一个崇尚传统的民族，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很难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可以预见，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将

在伊凡雷帝① 和彼得大帝② 的光荣中去找回民族的自我，而东正教也将在这一回归的历史中汇入俄罗斯文化的主流。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暴行和血腥的世纪，“ 美国历史学家

① 伊凡四世（雷帝）（Ivan Ⅳ the Ter-rible, of Russia, 1530—1584），俄国沙皇（1533—1584 年在位）。生于莫斯科，瓦西里三世大公之子。1533 年 12 月父死，伊凡立即被大主教达尼埃尔立为大公，由母亲叶琳娜代他统治，直到 1538 年 4 月叶琳娜死去为止。伊凡从 5 岁起在形式上管理朝政，但实际上他是上层贵族激烈斗争的中心。1547 年 1 月加冕，2 月迎娶阿纳斯塔西娅·扎哈利娜-尤烈娃为皇后。阿纳斯塔西娅经常做沙皇与廷臣之间的调解人。莫斯科的大公们一直惧怕鞑靼人的入侵，伊凡也怀有同样的心情。1547 年、1549 年、1552 年伊凡亲自出征，经过多次战斗，终于兼并了伏尔加河流域鞑靼人的喀山汗国。1556 年阿斯特拉罕汗国因慑于莫斯科大公国的霸权而自愿归附。随着伏尔加河两岸的平定，伊凡开始准备以武力开辟一条贯通波罗的海的航路。1558 年开始的利沃尼亚战争持续 24 年之久，直到 1558 年才缔结停战协定。对俄国来说，这场战争可谓劳民伤财，消耗极大。1553 年以后，伊凡同英国建立牢固关系。伊凡一生取得许多成就，他努力使俄国跻入欧洲强国之林，努力遏制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侵犯俄国的领土，鼓励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重视印刷术。他博览群书，擅长写作，虽然传世作品主要是政治性的，但他遣词造句的本领和尖刻讽刺的技巧却跃然纸上。

② 彼得大帝（Peter I the Great of Russia, 1672—1725），俄国沙皇（1682—1721 年）和皇帝（1721—1725 年）。1682 年与其兄伊凡五世（患重病不参与国事）同时即位，而由其姐索菲亚摄政。1689 年，推翻索菲亚新政。1697 年，化名出国旅行，先后到过普鲁士、荷兰、英国和奥地利等国，考察政治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1698 年国内近卫军谋叛，从维也纳仓促返国，镇压叛乱。执政期间积极举办工场，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建立以募兵为基础的陆海军。并建置行省，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1703 年建都彼得堡。1700—1721年发动北方战争，战胜瑞典，取得通向波罗的海出海口；1722—1723 年对波斯战争后，获得里海沿岸一带，为占领黑海港口，曾两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未果。由于推行扩张政策，不断增加赋税，募集新兵，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但总的来讲，彼得一世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俄罗斯伟大的政治家、组织家和改革家。

鲁道夫·J. 鲁梅尔在他 1994 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计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死难者就达 1.7 亿人。……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之前是亘古未有的。这里，若说是在回退到那种昏暗年代，是不贴切的，因为这种规模的大屠杀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① 危险和错误的思想中包括了在文化与传统、宗教和政体这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在踏进 21 世纪的时刻，我们研究历史中的宗教与政体的关系，其目的并不在政体上，而是着眼于宗教问题上。我们研究宗教对政体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无非是想说明宗教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往我们对此重视不够，以致在经济改革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的同时，却面临着宗教问题所引起的麻烦。宗教问题自来是国家大事，万万不可等闲视之。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宗教问题迟早要提到日程上来。面对那许许多多的人生问题，那人人难免的生死问题，每个人都会在内心深处追问，追问有限人生的价值，追问无限宇宙的意义。然而，这个人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却不是人人皆能回答的问题，只能依靠人类几千年文明赋予我们的智慧，而几千年的文明更多的是由宗教的历史组成的。更有我们的民族，在 21 世纪激烈的竞争中，除了经济和技术这些物质基础外，还需要有把我们的民族联系在

①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

一起的精神纽带，这也要靠我们的文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定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智慧，我们都殷切地盼望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